

# 理论动态318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1年12月10日

## 摆脱目前困难 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1981年12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

薛暮桥

最近，经济研究中心开了好多次会来讨论如何使国民经济摆脱“不良循环”，实现“良性循环”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有计划地稳步前进。但是，三十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失误，确实发生过起伏。“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是大起大落，工农业生产曾经急剧下降，经过调整后又迅速回升。1970年以来我们又急于求成，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要求过高，以至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工作上的又一次失误。这次失误到1978年达到顶点。1979年就开始调整，工业生产速度下降，1978年和1980年还在8%以上，今年可能降到3%。现在下降是否已到沟底，能否迅速回升，这是目前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一次曲折远没有前一次那样大，但持续的时间可能比前

一次要长一点。同上一次曲折相同之点是曲折的起源是要求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高速度增长，以致基本建设规模愈搞愈大，不但消费品的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生产资料的生产也满足不了工业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国民经济周转不灵，不能不降低生产增长速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同的是上一次的失误虽然比较大，但可以用甩包袱搞调整，容易治愈。这一次失误比较小，但要背着包袱搞调整，医治的时间也就不能不长一点。

什么是甩包袱和背包袱呢？主要是一，上次“大跃进”的主力是“小土群”，可以一脚踢开。此次跃进的主力是“大洋国”，其中还有二十二个从国外进口设备的项目，下马就不容易。已经签订合同的进口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无法退货，还要接受下来，按期付款。国内下马的项目许多机器设备也已经制造出来了，只能放在仓库积压。几十万基建职工不能遣散，还要照发工资。所以调整两年，积累率还只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80年的32.6%，这还不是从压缩积累基金，而是从扩大消费基金而相对地降下来的。二是“三年大跃进”中二千五百万农村人口进城，大多数是临时工，粮食供应一紧张，把二千万人退回农村去了。这次从1970年到1978年职工增加三千万人，增加的职工已经退不回去，与此同时还有大约一千万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要求回来，还有城市中的一些待业青年，不能不安排工作。所以，虽然困难的情况远没有上次严重，人民生活不是下降而是显著上升的，但调整的难度可能比上次还大一点，决不应当低估。

我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已经压了三年，但前两年并没有压下去。今年下了一批建设项目，投资可能减少160亿元，调整中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重工业生产下降，因此而影响到整个

工业的增长速度也显著下降。于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开始发生疑问，这样大幅度地调整是否正确？据我所知，已经发生了两个正在议论的问题：一个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是否过低，有没有可能同前两年一样保持在8%上下？他们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递增18%，并没有发生问题。六十年代初期经过三年调整，工业生产1964年增长19.6%，1965年增长26.4%，为什么这一次回升就这样困难呢？另一个是重工业生产下降是否不可避免，这样大幅度地下降是不是违反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会不会影响到今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提出这样的疑问是有理由的，答复这些问题要从目前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的国民经济需要调整，这一点大家是没有疑问的。可能发生疑问的是这样大幅度地调整是否操之过急（在国外这样的批评更多）？今后是否还要继续这样大幅度地调整？对这个问题，全党必须有一致的认识。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很快，但那时候基数小，从1952年的343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784亿元，五年只增加441亿元，而且这个胜利是轻装上阵取得的。从1978年到1980年背着包袱，工业产值从4231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两年就增加了761亿元，速度并不慢。今年由于比较大规模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一至十月工业生产只上升2.4%，其中轻工增长12.6%，重工下降了6.4%。调整过程中重工业速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下降幅度过大则有不正常的因素，但比1961—1962年两年下降将近60%要好得多。1961、1962年经过两年调整，1963年以后工业生产虽然迅速回升，但1965年工业总产值只回升到1394亿元，比1960年的1659亿元还低得多（重工业1965年为691亿元，1960年为1100亿元）。应该说，这一次经济工作的失误，比上一次纠正得早一些，因此所受的损失小得多。1981年

工业生产速度可能降到3%，但不会出现负数。

再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过去三十年重工业一直是优先增长，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重工业增长速度快于轻工业。我国农民还占总人口的80%，重工业所占比重太大，就会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着说明情况，把几个关键年份的比例关系列下：

	农 业	轻 工 业	重 工 业
1957年	43.3%	31.2%	25.5%
1960年	21.8%	26.1%	52.1%
1965年	37.3%	32.3%	30.4%
1978年	27.8%	31.1%	41.1%
1980年	30.0%	32.9%	37.1%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1960年的比例关系极不正常，1965年调整得比较合理。1978年的比例关系也不正常，1980年比较好一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当然，调整应当使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快于重工业，而不应当让重工业出现负数。今年一至十月重工业大幅度下降，首先由于煤炭下降0.8%（统配煤下降4%），石油下降4.9%，能源减产会影响整个工业的增长。这个下降，并不是由于我们削减了能源的投资，1970年以来能源的投资比例是一直上升的，这几年也并不例外（能源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一五”时期是13%，“二五”是16.9%，“三五”是16.8%，“四五”是18.4%，“五五”是21.7%）。下降原因，一方面是1978年以前要求煤炭当年大幅度增产，采掘比例失调，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些精神不振，经过努力现已有所改进。现在我们仍在大力保证能源的投资，这要在五、六年才能发生效果。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机械工业。我国机械工业的产值约占整个工业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太大，在

基本建设规模很大时候似乎任务饱满（许多产品质量不好，大量积压）。这几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再加上进口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生产能力过剩一下子暴露出来了。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产值大约下降15%，使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因此而降低3.75%。机械工业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它的服务方向。过去机械工业绝大部分是为新建企业服务，特别是为重工业的建设服务。如果转变到为老企业的更新改造服务，为农业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服务，再加上机械工业本身的合并改组，现有生产能力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机械工业服务方向的改变特别是本身的合并改组，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能要求在一两年内就调整好。今年重工业生产一季比一季好，估计明年可以停止下降，甚至略有上升。目前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调整，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内部更需要调整，不惜因此而暂时放慢速度。如果为着追求速度而停止调整，不出几年又会比例失调，生产和建设的效率下降，将被迫再来一次调整。

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形势一季比一季好，下列数字（与上年同期比较）可以说明。只要稳步前进，今后几年的增长速度很有可能逐渐上升。

	总产值	轻工业	重工业
今年1—9月	1.5%	12.4%	-7.6%
第一季度	-0.2%	9.9%	-8.7%
第二季度	1.7%	13.1%	-7.8%
第三季度	3.0%	14.0%	-6.4%

中央决定把整个“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作为调整时期，这个决策非常正确，决不应当动摇。与上次调整相比，现在类似1962年。1963年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候，国家计委曾经争论

调整时期是否结束。向国务院汇报时，周总理说，1963年起还要调整三年，到1965年才能完成。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在调整时期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平均每年递增4%（前两年低一点，后三年高一点），这不是低速度，同西方国家比较可以说是中速度，高于美、英、法、西德等国。计划只能定低一点，在执行中力争超过。这次工业生产没有大幅度下降，因此也不会有大幅度回升。过去三十年，我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已经从1952年的二百多亿元上升到四千多亿元，我们的家产已经不小。由于过去我们把投资主要用于新建企业，不重视老企业的革新改造，许多工厂连应有的设备更新也没有及时进行，弄得破旧不堪，常年带病运转，这是我们生产效率逐步降低的重要原因。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中，我们必须下决心结合着企业整顿和改组，完成几千到几万个老工厂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生产效果，以此来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展望未来，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六五”时期计划最好安排4%，争取达到甚至超过5%；“七五”时期计划安排5%，争取达到甚至超过6%。如果我们在前十年完成了工业生产的结构改组和技术革新，打好底子，在后十年（九十年代）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8%，有些年份也有可能达到10%上下（日本小林实在他所著《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中估计，八十年代前期生产每年递增5.5%，后期递增6%，九十年代前期每年递增7%，后期递增8%，与我们的预测接近）。今后几年由于重工业不可能高速度增长，而轻工业为满足市场需要则必须高速度增长，预计轻工业所占的比例仍将继续提高。但重工业必须停止下降，而且逐渐回升。随着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全面展开，重工业包括机械工业在内的增长速度就会迅速回升，到九十年代又有可

能超过轻工业。

其次，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过去我们说现在国民经济存在着潜伏的危险，这主要是指近几年财政上出现巨大赤字，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市场物价难以稳定。1979、1980两年货币发行增加134亿元，今年预计仍将增加60亿元上下，货币增长的速度超过商品供应增长的速度。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超过一定限额，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人民不向银行存款，反而提取存款抢购物资，物价急剧上升（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这种情况，1962—1964年回笼了40—50亿元货币才稳定下来）。前两年通货虽然有些膨胀，但银行存款还是迅速上升，远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苗头。今年经过压缩，财政收支可以达到基本平衡，货币的财政发行可以大大减少，潜伏的危险是否已经过去？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还没有过去，决不能掉以轻心，原因是：

第一，去年的财政赤字是靠今年发国库券四十几亿元来弥补的，今年仍有二十多亿元赤字。今后四年采取各种措施以后，估计每年还有几十亿元赤字，需要每年发一些国库券，部分赤字可能仍然要增发货币来弥补。发国库券可以争取时间渡过目前困难，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但效果只有五年，五年以后开始还本付息，逐渐用新债来抵旧债。在财政收支还不能不靠借债来平衡，还不能停止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多发货币的时候，潜伏的危险还不能说已经消除。

今年下决心稳定物价，零售价格预计只上升2%（实际上可能超过此数），我估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减少工业利润和增加物价补贴而达到的，这将增加财政上的困难。去年物价补贴加上外贸亏损（也是物价补贴）已经达到300亿元，已占财政收入的30%。估计今年增加物价补贴可能超过20亿元，加上外贸亏损接近40亿元，几乎

等于全部财政增长数额。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是不保险的，它将增加财政赤字，并因此而被迫增发货币，促使物价继续上升。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逐步减少物价补贴，而让补贴逐年上升，就很难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和不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也就难于保持物价的稳定。

在讨论中大家还研究了几个问题：第一，今后若干年内每年还有几十亿元财政赤字，尽管赤字数比西方国家小得多，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大家都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心。有人说，如果我们的财政赤字用于经济建设，而且建设的经济效果相当好，就可以为今后增加财政收入创造条件。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财政赤字不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是主要用于贴补亏损企业和物价补贴，这些都是不会产生经济效果和增加财政收入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已经很大，再增加基建投资会进一步降低经济效果，不可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财政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来消灭生产、建设中的巨大浪费，提高经济效果，逐步减少企业亏损和物价补贴，达到财政收支平衡。

第二，今后几年我们每年还要增发几十亿元货币，这对经济发展利弊如何？如果象前两年那样我们主要为着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那是有危险的。据银行估计，现在流通中的货币大约已经多了五十亿元，影响到市场和物价的稳定。当然，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因为增加收购农产品和适销的工业品而增发贷款，或者对投资少、收效快的中小企业建设，特别是对收效更快的老企业的更新改造增加贷款，那是有好处的，多发的货币可以在短期内收回来。由于我们已经存在轻微的通货膨胀，今年前几个月对银行信贷控制过严，影响了一些农产品的收购，推迟了某些有利的更新改造，四月起已

经放松一点，这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今年如果增发几十亿元货币，将主要用于扶助生产的发展，与前两年的财政发行性质已经多少不同了。

在讨论中大家对是否存在信贷膨胀发生争论。一种意见是，过去两年增发134亿元货币，超过市场流通需要，银行贷款还助长了一些重复浪费的建设，已经发生信贷膨胀。另一种意见是，过去两年多发货币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是财政发行，不是信贷膨胀。这样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但与信贷膨胀不同。现在企业存款和人民储蓄大幅度地增加，银行可能而且应当发放一部分贷款来扶助生产的发展。当然，贷款总额应受国家计划控制，遵循计划所要求的发展方向，避免重复浪费的建设。有些同志看到银行有将近一千亿元存款（包括储蓄），认为可以大大增加经济建设的贷款，这也是不现实的。这些存款，一部分已经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大部分用作企业流动资金，银行并没有储存现金。如果储存这样多现金，也就不需要增发货币了。

第三，对于利用外资，原来也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基本上趋向一致。大家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对我有利，可以利用的外资是相当多的。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存在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物质条件和知识条件，不应当再重复1978年放手引进外国机器设备的错误。利用外资要注意“借”、“用”、“还”，重点应当放在“用”字上。过去二十二个项目大部分用得不好，不能够在短时期内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后来引进的上百个中小建设项目，绝大部分能在短时期内赚钱，取得外汇，有偿还能力，这样利用外资就不怕多。我们也要利用一些利息低、时期长的外资来进行能源和交通的建设，但投资多，收效慢，所以不宜过多。

第四，“六五”、“七五”时期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源，而能源的生产近十年内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为此，必须扩大能源的建设，同时节约能源，这两者究竟以何者为主？在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应以节约能源为主。节约能源必须更新一部分机器设备（锅炉和汽车等），也需要花资金，但比扩建所需投资少得多，而且不会引起交通运输的紧张。这就需要研究几个政策问题：一个是对耗能机具是否需要压缩产量？例如汽车今年积压三万辆，明年准备减产四万辆。多年来购买汽车作为“集团购买力”而限制很严，许多工厂、机关买了破旧汽车来修理使用，农村中普遍用拖拉机甚至手扶拖拉机跑运输，一路冒烟漏油，能源浪费严重。能否考虑增产耗油低的汽车，把耗油高的车辆顶替下来。为着省煤、省油，锅炉、汽车这些耗能机具必须进行更新，鼓励工厂、农村买新汽车来代替破车和拖拉机，以旧换新。这样，耗能机具究竟应当减产，还是应当增产，就很值得研究。

另一个是鼓励节能不能光靠宣传，要有一点经济压力，这就要下决心逐步提高煤炭和石油的价格。这样会使企业增加生产成本，从长期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如此不能督促企业千方百计节约能源。1973年国际石油猛烈提价以后，西方各国一反过去进口石油年年激增的现象，这几年减少石油进口。日本基本上没有煤，没有油，节能工作做得特别好。去年石油进口减少10%，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减少10%，生产仍然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它发达国家也大量节省石油，现在国际石油已经发生过剩。我国有六亿吨煤，一亿吨油，是能源很丰富的国家（与工业生产相比），因此就造成能源惊人的浪费，十年内应当下决心从节能中求增产。农村中电和石油都有优待价格，因此浪费更加严重。去年农村供油已

经增至650万吨，每吨补贴120元，共贴8亿多元，今年还在继续增加。建议严格限制优待价，只有机耕电灌等用于农业生产的油、电才能享受优待，拖拉机跑运输和照明用电取消优待价格。

第五，目前我国不但在基建方面背着沉重的包袱，生产方面也背着沉重的包袱。许多“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浪费能源，产品质量差，亏损多，必须下决心进行整顿，实在无法存在的要关停并转。此外，还有过去十几年建设起来的大小三线工厂，有些厂建成以后无法开工，多少万工人和技术人员长期闲着没有活干，不但白拿工资，而且虚度大好青春，内心十分痛苦。这个包袱如何解决，也应当进行研究，不能再拖下去。当然，在大量待业人员还没有妥善安置以前，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困难的。许多职工不能遣散，只能集中起来学习培训，并为他们另找就业门路。这些工厂长期消耗大量的财富，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使我们轻装上阵。

综上所述，要摆脱国民经济目前的困难，实现良性循环，主要的标志大体上应当是：

第一，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数量，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消灭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生产和建设中的巨大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有待于国民经济调整和企业整顿任务的完成。从财政工作本身来说，除计委和财政部向国务院提出的增收节支的具体措施外，还要改革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加强税收工作（包括关税在内），重要税收应当直接上交中央，建立垂直的税务机关，逐步使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市场调节的重要杠杆。与此同时，还要逐步减轻物价补贴这个沉重的包袱，这就需要采取稳妥的步骤来调整物价，并相应改革工资制度，使工农生活在物价调整中不致有过大的变化。

第二，继续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以节约流动资金为重点进一步降低积累率(现在企业的流动资金超过2000亿元，如果每年压缩100亿元，积累率就下降3%)。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使各类生活资料生产增长能够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需要，各类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控制经济建设规模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勿使超过国民收入和各类社会产品可能供应的限度。

第三，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基础上，挤出较多的资金来逐步地、有计划地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促使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重要关键。为此，还必须同时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现有三十几万个工业企业必须进行整顿，哪些应该发展，哪些应该淘汰，哪些应该合并、改组，应当摸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完成了这些工作，经济效果就可以大大提高。

第四，逐步完成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近两年多我们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经济责任制方面进展很快，这对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这些微观经济的改革同宏观经济的改革没有很好配合。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后，改正了过去计划管得过多过死的缺点。与此同时，计划部门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利用价格、税收、银行利率等类经济杠杆，指引企业使它们的经济活动符合于国家计划的要求。过去几年，我们对物价的调整、税率和利率的改革都没有跟上去，以致有些企业为多得利润而增产价高利大的长线产品，减产价低利小甚至亏本的短线产品，进行重复建设，与国民经济调整发生矛盾。扩大企业自主权

还必须辅以经济立法和国家的监督检查，这个工作也没有跟上去。现在大家把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利润分配方面，企图以此来督促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在这方面虽然发生一点效果，但目前企业利润因物价不合理而不能正确反映它们的经营管理水平，而且歪曲了企业的经济核算，从而也就产生不少流弊。今后必须加紧研究宏观的经济的改革，在目前特别要研究物价调整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

第五，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职工队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彻底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领导的软弱和涣散状态。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精明强干，责任心强，年老体弱和软弱无能的下决心精减下来，另行照顾。其他干部和职工也必须职责分明，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逐步精减多余的、不称职的职工，组织学习或者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现在青年待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精减职工还有困难，必须慎重进行。退职的领导干部必须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精减的职工年青的要有计划地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业务水平，年老体弱的退休或另行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后一定要逐步打破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能奖不能罚的“铁饭碗”制度。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提出来请大家讨论。